后疫情时代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理论发展与实践图景

张云钒 李卫东[1]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武汉 430070

摘要

新冠疫情的爆发为健康传播学提供了独特的研究场域，多样化的话题涌现、多主体复杂互动的传播场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视角，短时间内诸多研究成果集中呈现。研究热点主要包括疫情期间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主流媒体的话语构建、社交媒体健康信息传播机制及治理、人群健康风险感知与健康信息接触及健康行为的影响机制、舆论引导与谣言治理等。健康传播与风险传播、科学传播等紧密交织，云医疗等智能化健康服务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健康传播赋予了新特征。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传播学导向”特征愈发显著，跨学科合作进一步深入，但是在研究理论的构建和应用方面依然存在桎梏，研究范式仍待突破，需要进一步革新“健康”理念，转向践行“以人为中心”的健康传播研究。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健康传播、Citespace、内容分析

引言

2019 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深刻影响了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和每一个个体的生产生活，至今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福祉。在全社会应对新冠肺炎的进程中，“信息疫情”、“健康风险”、“疫苗接种”等一系列健康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议题大量涌现，健康传播学者针对于疫情期间的信息发布、舆论引导、媒介治理以及健康教育等话题开展了多维度讨论，构成了危机语境下健康传播学研究的新图景。而随着全球进入后疫情时代[1]，国内健康传播学研究也将带着“疫情防控”这一独特的时代印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本文将通过梳理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健康传播领域主要研究议题、研究热点分布以及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应用情况，总结后疫情时代国内健康传播研究在理论发展与实践方面展现出的鲜明特征。

后疫情时代国内健康传播主要研究议题

1 张云钒，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通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037 号华中科技大学，邮编：430070。联系方式：zhangyunfan@hust.edu.cn，15927136916
李卫东，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037 号华中科技大学，邮编：430070。联系方式：liweidong@hust.edu.cn，13886175809

1. 数据来源

为了更为直观地展现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健康传播领域的主要研究议题分布情况，本部分采用基于 Citespace 的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展开探讨。经过文献检索和梳理发现，相较于国外健康传播相关研究问题的讨论大多集中于 *Health Communication* 和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两本 SSCI 期刊，基本可以代表国外健康传播领域的主要研究趋势的情况[2,3]，国内健康传播议题讨论散在分布于传播学、医学、信息学等多个不同学科类别的期刊中，难以以期刊为对象进行文献计量分析[4]。所以针对中文文献，研究在中国知网以健康传播、健康信息、新冠疫情、传播等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构建检索式为 SU=(健康传播+健康沟通+健康信息)/((COVID+新冠+疫情+新型冠状病毒+公共卫生+健康)*(新闻+报道+传播+媒体+媒介+信息+微博+微信+短视频+广告))，限定检索范围为发表在 SCI 来源期刊、北大核心、CSSCI 以及 CSCD 等数据库中的期刊论文，时间跨度为 2020-2022 年，共检索到论文 1682 篇，经过筛选，删除了传染病学、流行病学、临床医学等领域中的与传播学不相关联的文献，最终返回了 1540 条有效结果。

2. 数据分析结果

1. 学科与期刊分布

首先分析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研究论文的学科分布情况，参照中国知网学科分类的统计结果，2020 年-2022 年间 1540 篇论文中有 631 篇（占比 40.97%）属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其次为预防医学与卫生学领域（138 篇，占比 8.96%），医药卫生方针政策（108 篇，占比 7.01%）以及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106 篇，占比 6.88%）也占有一定比例。

从期刊分布的角度来看，如图 1 所示，新闻传播学类期刊占有绝对比例，《青年记者》、《传媒》、《电视研究》以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四本期刊相关文章占比超过了 25%。预防医学类期刊如《中国健康教育》以及图书情报类期刊如《图书情报工作》各占比 3%左右，与学科分布的趋势基本一致。

图 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文章期刊分布情况

2. 主要研究议题

为进一步梳理后疫情时期我国健康传播领域的主要研究议题，使用

CiteSpace 进行共词分析，设置时间跨度为 2019-2022 年，单个时间分区长度为 1 a；聚类词来源为标题（title）、摘要（abstract）、作者关键词（author keywords）；聚类词库选择为突现词（burst terms）；节点类型为关键词（keyword），提取每个时区中被引频次最高的 50 个关键词，生成的关键词图谱如图 2 所示。图中共有 268 个节点，272 条连接，网络密度为 0.0076，其中出现次数较高的关键词在图中显示为较大的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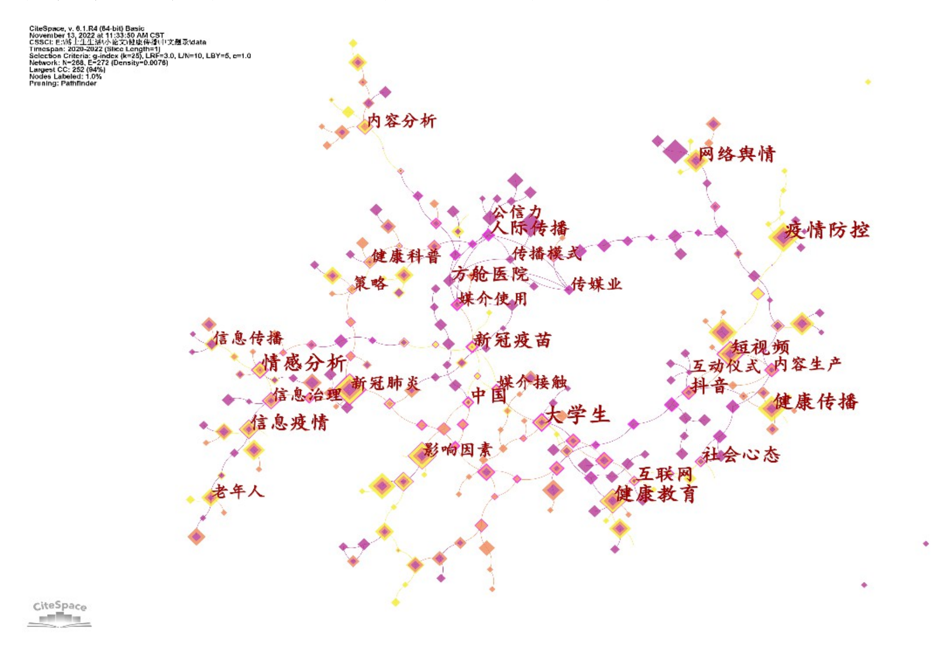


图 2：关键词共现图谱

结果显示，从关键词共现频次来看，除“疫情防控”、“新冠肺炎”、“健康传播”之外，出现的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包含“主流媒体”、“短视频”以及“社交媒体”等。具体而言，对于“疫情防控”的讨论多从媒体融合与媒体信息报导[5,6]、网络舆情应对与谣言治理[7,8]以及媒介使用效果[9,10]等角度展开；“新冠肺炎”涉及的研究话题则包括疫情信息发布[11,12]、舆论引导[13]、居民的健康信息获取及利用行为[14]、医患关系[15]以及特殊人群照护[16]等；“健康传播”相关的研究议题包括居民健康行为模式[17]、健康传播策略构建[18,19]以及传播效果评估[20]、健康传播平台的建设和规制[21]、媒介接触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接触和使用[22,23]等；对于“主流媒体”的讨论涉及到主流媒体传播生态的建设[24]、传播策略的创新[25]、短视频等创新的媒介形式带来的影响[26,27]等；“短视频”相关的研究议题包括短视频内容生产及传播机理[28,29]、短视频在疫情防控中的主要作用[30]、短视频平台及内容治理[31]等；对于关键词“社交媒体”的讨论则涉及了社交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与传播机制[32]、用户对于社交媒体使

用的行为学研究[33,34]以及社交媒体治理特别是虚假信息的甄别和处理[35,36]等多个研究视角。

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测量节点在网络中的结构属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节点具有高中介中心性代表该节点对应的文章大多具有跨学科性质，连接两个或多个不同学科的节点，具有枢纽作用[37]。在 Citespace 中计算各个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并按高到低排序，结果显示具有较高共现频次的“健康传播”、“短视频”、“社交媒体”、“新冠肺炎”、“主流媒体”等同样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串联起了多个研究主体和不同的研究视角。

表 1：高频及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列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关键词	中介中心性
1	疫情防控	133	健康传播	0.26
2	新冠肺炎	105	短视频	0.23
3	健康传播	84	社交媒体	0.22
4	主流媒体	72	新冠肺炎	0.22
5	短视频	59	疫情防控	0.19
6	社交媒体	53	风险感知	0.16
7	影响因素	50	新媒体	0.16
8	健康信息	47	网络舆情	0.15
9	健康教育	45	主流媒体	0.14
10	舆论引导	39	抖音	0.13
11	网络舆情	36	媒介接触	0.12
12	疫情	36	信息传播	0.12
13	媒体融合	32	疫情	0.12
14	新媒体	30	健康教育	0.12
15	信息传播	24	健康科普	0.11
16	网络谣言	23	大学生	0.11
17	风险感知	21	媒体融合	0.11
18	健康素养	21	内容分析	0.1
19	国际传播	20	信息治理	0.1
20	疫情报道	19	科学传播	0.1

后疫情时代国内健康传播热点研究领域

为了进一步深化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寻找主要的研究热点，利用 Citespace 关键词聚类的功能进行聚类分析，利用对数似然比 LLR 算法得到聚类图谱，从聚类图谱可以看到 Modularity 聚类模块值（Q 值）为 0.6835，大于 0.3，由此可知本聚类结果显著；并且 Mean Silhouette 聚类平均轮廓值（S 值）为 0.8643，大于 0.7，意味着本聚类可信度较高[37]，聚类可视化结果见图 3。

学者们紧紧围绕健康传播的媒介、内容以及效果等方面展开研究，共形成了 14 个关键词聚类，聚类名称、节点大小、轮廓值及聚类标签如表 2 所示。经过对所示聚类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共形成四大热点研究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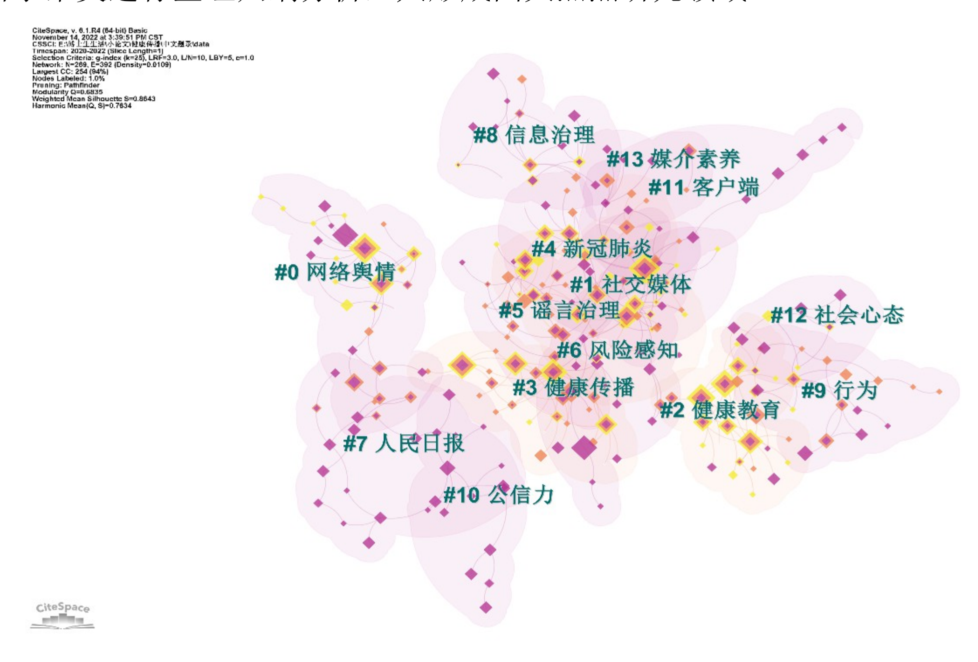


图 3：关键词聚类图谱

3. 疫情期间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主流媒体话语体系的构建

这一类研究热点包含的主要聚类名称为#健康传播、#人民日报、#客户端。学者们针对主流媒体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即主流媒体健康信息的内容生产与发布策略以及从短视频的视角探讨主流媒体的迭代景观。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复杂多变的疫情防控形势也带来了各类信息的流动量剧增、流动速度加快，真假信息混杂，对于民众的信息接收及辨别能力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在这之中，主流媒体权威、真实、全面的报道传播,是凝聚防灾共识、消弭信息鸿沟、有效应急处理突发灾害事件的关键一环。围绕主流媒体如何优化内容生产与发布策略，更高效地传播健康信息这一话题，学者们重点探讨了主流媒体内容生产的基本原则、逻辑空间以及内在张力，主流媒体在突发公卫事件等不确定性议题报道过程中对于科学理性的把握、对于公众信息需求的准确探查与回应等，在革新话语体系、扩展传播渠道、创新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提出了优化策略。此外，以医疗机构为主体的健康科普类信息大众化传播策略探索与效果评估也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话题。

短视频作为当前互联网平台最积极的产品形态，也参与到了主流媒体对于“疫情”的新闻报道中并成为主流媒体迭代升级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主流

媒体短视频内容生产背后是媒介技术、经济资本以及社会影响力资源的有效整合，通过高效的生产机制、立体的视觉表达以及丰富的情感调控等策略，短视频在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在叙事视角、话语模式以及价值呈现等方面表现出较为鲜明的特征[38]。短视频相比文字媒体具有更强的视觉冲击，且具有碎片化特性，更符合民众的信息获取习惯，其已成为健康信息的重要接触渠道之一。学者们重点讨论了疫情期间主流媒体短视频内容生产的策略、特点与趋势，认为主流媒体的短视频内容呈现赋予了主流媒体更多的灵活性，即可以采取和广大用户同样的视听形态和话语方式在同样的界面上进行沟通、对话与交流，在情感动员、促进价值认同与情感归属、建构科学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主流媒体的迭代升级还表现为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抗击疫情的关键阶段,5G 凭借其高速率、低时延、广连接的技术能力和网络优势,极大优化了主流媒体的新闻信息采集、发布和互动的全流程；结合数据算法与播音主持专业性的 AI 主播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疫情的报道和应对；“新闻海报”等视觉化创新应用也极大提升了核心信息的传播效率以及民众的接受程度。关于新技术赋能下主流媒体如何进行健康信息传播的模式创新，讨论和探索也较多。

4. 疫情之下社交媒体健康信息传播机制及治理

这一类研究热点包含的主要聚类名称为#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既包括公共的社交网络，例如微博、知乎、人人网等，也包括微信、QQ 等私密社交平台，随着社交媒体平台功能的不断丰富完善以及用户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其已经成为了公众获取健康信息最为直接和便利的途径，也成为了公众发布健康信息、进行健康咨询、需求疾病治疗最重要的渠道[32]。后疫情时代针对健康传播视域下社交媒体的讨论集中于三个维度：第一是公众基于社交媒体的健康信息搜寻、转发等行为的产生逻辑与影响因素分析；第二是社交媒体在弥合公共卫生资源的不平等，促进疫情之下公共沟通和公众参与过程中的作用探讨，以及面向海量的社交网络数据所衍生出来的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辅助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监测的讨论；第三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健康信息治理。

社交媒体成为健康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社交媒体用户健康信息接触、替代搜寻以及转发行为以及信息规避行为等话题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场域。学者们从健康信息认知、行为动机和行为实施等多个环节展开了讨论，健康信息认知维度下的讨论包括对于健康信息内容的认知、对于信息质量的认知以及对于健

康信息风险研判等；行为动机维度下的讨论则涉及用户健康信息获取需求的衡量、信息焦虑的抵御或者健康损失的规避等；行为实施维度下的讨论包括影响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转发行为产生的因素以及作用机制，或者是对于行为执行意愿的测量。社交媒体在乡村社会防疫动员中的功能、社交媒体用户的倦怠情绪与转移行为、社交媒体使用对于疫苗接种行为的影响等都是较为热点的研究话题。

受社会经济地位、生活环境、健康素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民众个体之间在健康信息资源获取和利用上必然存在着

平等性，而这些

平等性往往会隐含健康风险乃至带来健康灾难[32]。而社交媒体为民众获取健康信息和参与互动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在社交媒体上任何公众都可以成为传播中心并通过公众参与弥合公共卫生交流中的不平等，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超越信息交换的关系，从而促进更明智的政府决策。基于社交媒体的健康传播公众参与的讨论主要从公众沟通和公众践行展开，在突发公卫事件发生伊始，政府及时通过各种渠道将准确真实的信息传达给公众，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及时帮公众建立起正确的认知并引导公众的健康行为是信息沟通的关键。而公共践行囊括了相关官员、专业人士，以及充斥着各种感知的公众、媒体组织等，社交媒体的协作性促进这些群体间的信息多向流动。

在突发公卫事件中，社交媒体广泛连接、信息流动迅速的特点也为谣言扩散、情绪煽动等现象提供了温床，所以针对社交媒体的信息治理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主要包含社交媒体中不实信息的传播类型、传播主体和信息传播机制的探索、虚假健康信息特征识别、社交媒体中“信息疫情”的抗击、辟谣信息的传播效果评估等，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社交机器人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功能与挑战也逐渐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5. 人群健康风险感知、健康信息接触及健康行为的影响机制

这一类研究热点包含的主要聚类名称为#媒介素养、#行为、#社会心态、#健康教育、#风险感知。经过梳理后发现该研究热点的讨论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居民对于健康风险的认知与应对；第二是对于重点人群的健康教育、健康素养以及健康行为的关注。

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各类不确定性随之增加，各类风险因素交织使得

风险社会成为常态，健康风险因素也广泛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对于健康风险因素的感知、识别以及应对也成为了疫情防控中的关键一环。在风险感知方面，有学者从信息源、信息内容、信息用户、政府应急表现以及社会环境信号等角度出发构建了风险信息感知的影响因素模型[39]，也有学者比较了社交媒体与权威媒体在影响居民的风险感知与防疫行为方面的多元作用[40]。医务人员、科学家群体作为在健康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信息发布主体，对于新冠疫情风险的认知与应对关乎到有序的疫情信息传播体系能否顺利运行，所以针对医务人员和科学家群体的风险应对言论及做法的研究也较多，进而延伸到了公众信任和劝服效果的讨论[41,42]。

重点人群特别是健康脆弱人群的健康教育、健康素养以及健康行为的引导一直是健康传播领域的热点话题，新冠疫情衍生出的健康风险对于重点人群造成了更深层次的冲击，在此背景下，学者们重点讨论了老年人的健康信息接触、健康信息源选择、健康信息替代搜寻、健康信息分享、健康信息规避等行为的现状及主要的影响因素[43]。除老年人之外，乡镇居民对于突发公卫事件的认识与健康需求、贫困地区青少年互动健康素养、流动人口健康教育与健康素养、高校学生新冠肺炎疫情知信行等研究对象也话题也占有一定比例。在健康行为方面，新冠疫苗的接种行为的关注颇多，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包括疫苗接种的认知、意愿，媒介接触对于公众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认知架构研究，新冠疫苗信息框架对于疫苗犹豫的影响等。此外，也有学者关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民众的社会心态在网络空间的表达与形塑借助数据与计量模型等，对公众的风险感知、社会心态以及基于此而呈现出的行为规律等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44]。

6. 疫情期间的舆论引导与谣言治理

这一类研究热点包含的主要聚类名称为#谣言治理、#信息治理、#网络舆情、#公信力、#新冠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短时间内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短时间内舆论热点频发、舆论热情居高不下，而疫情信息的不确定性以及民众尚未对新冠病毒建立起科学认知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扩散创造了机会，舆情引导与谣言治理复杂交错，极大考验着政府的治理能力，在此过程中，政府公信力的维护和提升又成为了关键环节。所以，学者们针对疫情期间舆论引导与谣言治理的讨论也主要从网络舆论的传播机制与干预研究、网络谣言的特征分析与治理路径研究以及政府形象塑造与公信力提升研究三个维度展开。

疫情防控背景下，网络舆论快速生成、发酵、爆发，呈现出舆论格局扁平化、舆论内容嘈杂化、舆论形态碎片化、舆论效能叠加化与舆论生态复杂化的特点[45]。在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相关研究中，学者们着重讨论了重大疫情中网络舆情的人群、内容和情绪多属性演化规律[46]，探索网络舆情治理中信息生产者、信息传递者和信息分解者 3 类主体的演化博弈[47]，也有学者基于情感分析视角以及理性疗法视角分析突发公卫事件中舆论时空演化差异以及治理策略。网络舆论研究的另一个视角是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的网络舆情干预策略，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网络舆情传播的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舆情治理压力和难度更大，研究者们在分析了相关平台舆情演化规律之后提出了完善对自媒体网络舆情中盲点的预防和控制、基于大数据构建自媒体网络舆情的预警体系等应对策略[48]。

健康传播中网络谣言的治理研究集中于网络谣言生成的诱因、路径、传播机理以及治理策略。网络谣言作为一种复杂的信息结构，是网络舆情的一种畸变形态，研究发现谣言的产生及传播与政府的信息缺位与权力博弈、媒体失范与圈子极化、公众恐慌与素养缺失等因素紧密相关，互联网的裂变传播、社交背书、隐匿技术等特质，加速了网络谣言的扩散[49]。学者们通过基于传染病学或者信息学基本理论构建网络谣言传播的模型来分析影响谣言传播的内在机理，解构“信息疫情”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路径，并对于疫情之下特定事件中谣言的影响以及辟谣效果进行了评估。在谣言治理方面强调政府公信力建设、主流媒体的建设性新闻的理念与实践、法律制度的完善、公众媒介素养的培养的重要作用。同时，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以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关键责任主体,去中心化、人机协同的谣言治理新范式也在逐步成熟[50]。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过程中的政府形象传播和公信力建设是有效化解公共危机的关键，学者们重点关注了疫情期间政府针对疫情信息的发布策略、新闻发布会的质量、网络舆情中的政府回应策略、政府官员的话语策略与政府形象修复等话题，从政府新冠疫情信息发布对于政府信任的构建路径、突发公卫事件中官方与民间的风险沟通策略、危机修辞视域下的政府形象传播建构与优化等角度进行了讨论。

表 2：基于 LLR 算法的聚类结果

聚类名称	节点大小	轮廓值	对数似然比（LLR）聚类标签

#网络舆情	**28**	0.849	疫情防控；慢直播；情感分析；重大疫情
#社交媒体	**26**	0.737	国际传播；信息传播；内容分析；微博
#健康教育	**26**	0.898	健康信息；影响因素；健康素养；老年人
#健康传播	**24**	0.923	短视频；主流媒体；新媒体；内容生产
#新冠肺炎	**22**	0.819	舆论引导；信息疫情；辟谣；媒体融合
#谣言治理	**22**	0.86	网络谣言；疫情；新闻媒体；社会治理
#风险感知	**19**	0.888	疫情信息；传播模式；问卷调查；感染防控
#人民日报	**17**	0.909	医疗队；公共危机；叙事策略；传播创新
#信息治理	**16**	0.75	新闻发布；信息需求；风险沟通；信息共享
#行为	**16**	0.948	知识；大学生；态度；媒介实践
#公信力	**13**	0.845	综合医院；儿科；引导舆论；媒体应对
#客户端	**12**	0.954	传播格局；医护人员；媒介；肺炎
#社会心态	**7**	0.931	网络舆论；共情传播；动力机制；未来预期
#媒介素养	**6**	0.953	互动仪式；社会情绪；柯林斯；媒介生态环境

主要研究理论及方法的使用

研究理论的使用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是整体来看健康传播领域研究中学者们对于经典理论的利用率并不高，在纳入的1540篇文章中，仅有122篇明确使用了经典的模型或者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多数文章均聚焦于特定的研究议题依据自拟的框架进行分析和解读，经典理论的引用较为少见；第二是研究理论的使用较为分散，理论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呈现多样化。在122篇明确使用了经典理论或者模型的文章中，使用频次较高的理论包括刺激有机体反应S-O-R理论（6篇）、信息生态学理论（4篇）、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4篇）、信息搜寻理论（4篇）以及SEIR模型（4篇）等，具有较为鲜明的信息学和行为学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前景理论[51,52]、不确定性管理理论[53]以及社会燃烧理论[54]等行为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领域相关的理论也逐渐进入了健康传播学者的研究视野。

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在纳入的样本中超过50%（792篇）的论文没有明确使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方法，此类论文多采用叙事性的行文方式来表达观点，在逻辑框架和证据支撑方面稍显不足，研究方法使用的统计结果与王秀丽[4]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方面，学者们多使用问卷调查法（58篇）、结构化或半结构化访谈（58篇）进行数据获取，也有4项研究使用了爬虫工具对于网络文本进行爬取以获得研究样本。在数据处理方面，主要包括内容分析法（44篇）、文本分析（10篇）、案例分析（8篇）、扎根理论（10篇）以及虚拟（或数字）民族志（4篇）等。综合来看定性研究类的文章依然占有较大比例，

定量研究的文章比例较疫情之前有了一定增长[55]，内容分析法是应用最为普遍的研究方法[56]，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使用数据建模的方式来进行影响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从研究方法使用的主题分布来看，问卷调查以及结构或半结构访谈等主要集中于研究个体或者特殊群体的媒介使用行为及效果，健康信息的认知、搜寻、分享和规避行为以及健康素养评价，视角偏向微观。内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法等则主要在大众媒体的内容生产、传播机制与效果、舆情演化以及政策内容分析等较为宏观的研究话题中使用。

后疫情时代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理论发展图景

7. “传播学导向”愈加显著，健康传播进入跨学科合作新阶段

无论是从学科与期刊占比情况，还是从研究议题分布来看，后疫情时代的健康传播学研究已经充满了浓厚的传播学色彩，“传播学导向”愈加显著，基本遵循了健康传播学近十年来的发展趋势[4]。从研究热点分布状况来看，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已然从“传播效果研究主导”的阶段走出，关注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构建、社交媒体的健康信息传播、民众健康行为的形成机制以及谣言治理等话题，媒介的社会意义研究、社交网络研究以及健康叙事研究成为新的研究重点。

从学科融合的角度来看，国内早期的健康传播在新闻传播领域侧重于健康信息传递、利用以及行为改变，在公共卫生领域则以“健康教育”来诠释健康传播，学科间的交流融合并不充分，2013 年前后健康传播理论与公共卫生、社会学等逐渐产生较多的碰撞和影响[55]，而新冠疫情进一步推动了传播学与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以及医学管理领域的加速融合。新冠肺炎相关的知识普及是疫情防控相当关键的环节，而医学知识本身具有一定的知识壁垒，需要经过专业内阶段、跨专业阶段、教学论阶段以及大众化阶段之后才能为大众所接受[57]，这一方面促使健康传播学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求研究者必须基于大众认知的角度将复杂晦涩的专业知识进行解构和传播，在此过程中，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范式与健康传播的话语体系得以进一步交叉。在进行研究议题的梳理中也发现，健康传播学者们对于健康信息、健康行为的研究也逐渐引入了治理视角，不再单纯讨论传播机制与效果，而是进一步就谣言传播、不良健康行为等现象提出相应的应对方案，辅助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

8. 研究理论建构与使用有部分探索，但总体上较为陈旧

研究发现，虽然近两年来学者们在理论应用或者理论构建上有部分探索，特别是公共关系、社会学等学科与健康传播发生接合之后，发展出了问题解决情境理论[58](Situational Theory of Problem Solving, STOP)、文化敏感性(Cultural Sensitivity)与文化本位理论[59](Culture-Centered)等。但总体上健康传播使用的理论都较为陈旧，需要发展更好地适应复杂和网络信息环境的理论和方法。周裕琼等学者在国内健康传播的理论应用的研究中发现有超过 50%的论文直接拷贝或者套用了西方理论，在中国语境下验证西方理论已经成为研究者的路径依赖[60]。

对于国内的健康传播议题的研究需要更加注重中国意识，从国家政策、社会风俗或者文化传统等角度解读乡村硬核抗议标语、医患关系、政府的疫情新闻发布策略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议题[60]。在进行社会、家庭视域下的健康传播研究时，家国同构、差序格局、乡土中国等都可以作为一些独特的观察视角对于社会现象加以解读。

9. 健康传播研究以媒介中心视角为主，研究范式依旧较为单一

无论是针对传统媒体或是新媒体，大众媒体或是社交媒体的探讨大多仍然以贝尔的中轴理论为依据，即从媒介参与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互动的视角进行研究

[61,62]。媒介中心依然是占主流的研究范式，表现为媒介化的大众传播研究、媒介化的人际传播研究以及健康教育中的媒介化形式研究等。有学者以医患关系的研究视角为例认为我国与海外学者在研究范式方便相比缺乏学术想象力，拘泥于典型的媒介中心视角而对于医患沟通中的语言、符码乃至于环境设计等因素少有讨论[63]。传播过程的发展不是单一由媒介技术决定的过程，还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健康传播研究中，仅以媒介技术视角出发往往会忽视对人的主体性维度的关注。

后疫情时代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实践图景

10. 健康传播与风险传播、科学传播等紧密交织

新冠疫情作为一种非常态的风险情境，冲击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同时也在形塑、改变、建构着人们的主观价值与行为方式[64]，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而言，这场新冠疫情是一堂风险社会的启蒙课，是中国进入现代风险社会的“成

人礼”[65]，新冠病毒带来的这一轮风险可能会逐渐消弭，但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其他风险仍然会广泛存在并继续产生影响。健康传播成为风险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一种独特的社会治理方式存在[66]，大众对风险的认知有赖于媒体传播的建构，传播媒介的存在使得民众逐渐构成风险防范与治理共同体的路径成为可能。在纳入的研究样本中，公众的健康风险感知、风险沟通以及风险应对行为等话题的研究众多，媒介接触与媒介使用几乎无一例外成为研究中必然提及的要素，也是改善公众的风险应对行为、提升风险应对效果的重要突破口。仅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新冠病毒、食品安全、健康隐私安全等不仅仅健康传播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风险传播和风险治理中的重点话题，且食品安全、健康隐私安全等话题在常态或者非常态情境下都需要研究和应对。

而科学传播与健康传播紧密交织的表现在于，一方面健康科普活动作为健康传播的重要实践形式，也是科学传播中“向公众诠释和传授科学知识”的重要任务的体现；另一方面，科学传播研究的一大传统是对影响公众科技态度的社会心理因素的归因研究，关注人们如何形成对于科学技术、科学家或者特定科技政策的态度[67]，健康传播研究中对于公众的“疫苗犹豫”、科学家形象建构、新兴医疗技术的接受态度等话题的研究与这一传统相契合。近年来科学传播越来越强调公众与科学家进行对话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疫情期间公众在微信群、社交论坛的健康信息交流也显示出了公众参与在提升健康传播效果中的重要作用，如何进一步提升公众在健康传播中的主动参与意识或许将成为下一阶段的研究热点。

11. 社交媒体在健康传播中的角色与地位越来越重要

社交媒体在健康传播中的作用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9 年之前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仍主要以大众媒体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以新媒体或者社交网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较少[68]，在本研究中，2020-2022 年以社交媒体为对象的健康传播学研究论文超过了 70 篇，社交媒体在健康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机制以及信息治理问题等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体、编辑等传统把关人的中介作用，具有明显的去中心化特征[69]，信息发布和传递得以更加自由，海量的发布主体和多样化的健康传播内容构成了复杂的健康话语网络。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健康信息发布与接受主体多样、信息内容复杂、信息结构各异，短时间内爆发的各类健康信息形成了巨复杂的信息网络。但是

公众对于日益庞杂的信息网络的识别和解码能力有限，特别是对于健康信息这一类具有一定专业壁垒的信息而言，信息的真伪识别和价值高低的判断都存在着巨大的挑战[68]，从而又给谣言的滋生和传播创造了空间。社交媒体显现出的广连接、泛在性、复杂性以及动态变化的特征使得它成为了健康传播研究中一个新兴的研究场域，一方面为卫生健康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机会，另一方面其中存在的数据滥用、隐私侵犯等问题也需要政府和学界作出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12. 云医疗等新兴健康服务模式迅速铺开，智能化为健康传播赋予新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社交隔离使得民众的信息交流活动大部分由线下转移到了云端，也带来了医疗系统健康服务模式的变革，5G+互联网智能技术赋能的云医疗服务迅速铺开，通过“互联网 ＋医疗”的延伸使医院的触角跨越间隔，在无实接触的情况下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广泛的领域内，满足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疫情发生以来，“健康码”作为一种云医疗媒介已经渗透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也成为了疫情防控的重要工具；远程会诊、远程手术等非接触式医疗服务数量迅速增长，操作流程、服务效果也在不断改善；互联网医院建设进入加速期，“线上问诊”逐渐成为民众就医的重要渠道。云医疗利用其媒介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的特征构建了医疗服务的新场景，使得健康传播从有限的现实空间走向了无限的虚拟空间，塑造了健康传播的新形态[70]。学者们在近两年的研究中也关注了数字媒体中健康信息的报导与呈现、在线健康信息的建构过程以及不同人群的在线健康信息寻求行为、在线信息查询对于医患关系的影响以及数字媒体对于健康促进的影响等话题，在新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探讨健康教育、健康素养提升等传统的健康传播议题。可以说，云医疗等一系列智能化的健康传播实践将成为下一阶段健康传播研究的显著特征。

研究结论与展望

综合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给国内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多样化的话题涌现、多主体复杂互动的传播场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视角，短时间内诸多研究成果集中呈现，国内健康传播学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但是必须看到，健康传播学仍然面临着研究理论应用和开发不足，研究方法使用较为单一等问题，纵使面对疫情期间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新议题，在理论与方法的突破上依旧稍显乏力，健康传播学想要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进一步突围，需要在研究视角和理念上逐

渐转变。

第一是关于“健康”的理念革新，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而不是没有疾病及虚弱现象(*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健康传播不应仍然遵循传统的健康观，即“无病即健康”，将研究视角更多转向有利于疾病预防的个体健康行为引导、健康生活环境的塑造、“预防为主”的社会观念的营造等，健康传播需要真正推动健康实践的发展。

第二是践行“以人为中心”的健康传播研究，新冠疫情防控行动开展以来，作为传播主体的民众主观能动性得以极大释放和调动，健康传播意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特征又为民众在健康传播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健康传播的主体不再只是默认的政府或者社会组织，“个人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得以践行和深化。健康传播研究需要进一步强调尊重受众的文化差异，以民众为中心来建构知识与故事，基于民众健康需求的多样性来搭建不同的叙事框架，从而极大改善健康传播的效果，并与卫生管理领域强调的从以医疗为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的健康管理服务”的观念相契合[72]。

参考文献

[1] 韩德勋, 赵士林. 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之辩再思考[J/OL]. 全球传媒学刊, 2021, 8(4): 120-134. DOI:10.16602/j.gjms.20210034.

[2] 王一帆, 曹博林. 国际健康传播的理论进路:现状、趋势与困境(2008—2018 年)[J]. 新闻春秋, 2020(5): 73-81.

[3] 马超. 国际健康传播研究的议题流变、研究主力与经典文献——基于健康传播领域两本 SSCI 专业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9(4): 95-112.

[4] 王秀丽, 罗龙翔, 赵雯雯. 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对象、学科建设与方法:基于范式建构理论的内容分析(2009—2018)[J/OL]. 全球传媒学刊, 2019, 6(3): 34-52. DOI:10.16602/j.gmj.20190024.

[5] 喻满意, 齐怀文. 发挥融合优势 凝聚抗“疫”力量——以津云新媒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J]. 传媒, 2021(03): 21-23.

[6] 田维钢, 温莫寒. 价值认同与情感归属:主流媒体疫情报道的短视频生产[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42(12): 9-14.

[7] 刘勘, 黄哲英. 重大突发疫情事件中的谣言识别[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9(01): 18-28.

[8] 曾祥敏, 杨丽萍. 自媒体环境下首都网络舆论话语空间生产与引导——基于 2019—2021 年微博热搜的共词分析和案例研究[J/OL].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03): 40-49. DOI:10.19997/j.cnki.xdcb.2022.03.019.

[9] 陈娟, 甘凌博. 公共卫生防控如何走向共识：一个在线社区传播的视角[J/OL].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05): 135-142. DOI:10.19997/j.cnki.xdcb.2022.05.013.

[10] 湛军, 王璐瑶, 郭政. 新冠疫情环境下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以公共社交媒体为调节变量的研究[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8(05): 93-109.

[11] 孟建, 裴增雨. 关于我国抗击新冠肺炎新闻发布的实证研究——基于九省区市新闻发布的实证分析和若干对策建议[J]. 新闻大学, 2020(03): 1-15+117.

[12] 聂书江. 新媒体背景下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具象传播——以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J]. 当代传播, 2020(04): 106-109.

[13] 张楠楠, 邓三鸿, 王昊, 等. 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的地区差异及其情感测度——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J/OL]. 情报科学, 2022, 40(09): 123-129. DOI:10.13833/j.issn.1007-7634.2022.09.017.

[14] 刘丽群, 谢精忠. 结构、风格与内容:社交媒体用户转发的信息特征——基于媒体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考察[J/OL]. 新闻界, 2020(11): 39-49.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0.11.005.

[15] 崔诣晨. 疫情防控时期医患和谐关系的心理动力模型[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2, 39(02): 102-104.

[16] 任航, 贾斐然, 张兴宇. 新冠肺炎疫情视野下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三重困境”与应对路径[J]. 新闻春秋, 2022(05): 38-45.

[17] 刘德寰, 王袁欣. 移动互联网时代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的族群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42(11): 141-147.

[18] 邹顺宏.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新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及策略[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0(12): 85-88.

[19] 李国顺. “丁香医生”微信公众号的内容传播策略[J/OL]. 新闻爱好者, 2021(06): 43-45. DOI:10.16017/j.cnki.xwahz.2021.06.010.

[20] 宁海林, 羊晚成.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卫健类抖音政务号为例[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3(01): 147-151.

[21] 史安斌, 李雨浛. “疫苗犹豫”中的媒体角色：平台治理与叙事重构[J/OL]. 青年记者, 2021(09): 90-93. DOI:10.15997/j.cnki.qnjz.2021.09.036.

[22] 解庆锋. 媒介使用、恐慌感对疫情期间社交媒体策展新闻的影响[J/OL]. 国际新闻界,

2021, 43(05): 43-64. DOI:10.13495/j.cnki.cjjc.2021.05.003.
[23] 赵云泽, 项甜甜. 社交媒体中健康争议性话题传播研究[J]. 新闻春秋, 2022(05): 30-37.
[24] 李金宝, 顾理平. 构建高度协作、共塑影响、深度融合的传播生态大系统[J/OL]. 传媒观察, 2021(10): 32-35. DOI:10.19480/j.cnki.cmgc.2021.10.007.
[25] 王灿发, 陈琳琳. 涉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主流媒体国际舆论引导实践及引导力提升策略[J/OL]. 新闻爱好者, 2022(03): 27-30. DOI:10.16017/j.cnki.xwahz.2022.03.026.
[26] 潘力, 余晓青, 李红秀. 主流媒体有关新冠疫苗的短视频报道探析[J/OL]. 青年记者, 2022(04): 58-59. DOI:10.15997/j.cnki.qnjz.2022.04.039.
[27] 赵淑萍, 李超鹏.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主流媒体情感传播策略研究——以三大央媒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短视频产品为例[J]. 中国出版, 2021(04): 46-51.
[28] 赵滢. 移动短视频盛行的传播机理与规范引导[J]. 人民论坛, 2020(24): 136-137.
[29] 李娜, 曹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短视频的情感动员机理研究[J/OL].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1, 74(06): 81-91. DOI:10.14086/j.cnki.xwycbpl.2021.06.007.
[30] 王皓. MG 动画短视频如何助力抗疫宣传[J]. 传媒, 2021(11): 56-58.
[31] 蔡之国, 孔令淑. 短视频“众神狂欢”乱象与现代化治理[J]. 中国出版, 2021(23): 57-61.
[32] 张克旭. 社交媒体在疫情危机风险传播中的核心作用与传播机制[J/OL].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0, 73(03): 26-35. DOI:10.14086/j.cnki.xwycbpl.2020.03.003.
[33] 吴布林;薛冬;杨克;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交媒体用户信息行为研究[J/OL].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10 vo 44): 137-141. DOI:10.16353/j.cnki.1000-7490.2021.10.018.
[34] 顾润德, 陈媛媛, 董伟. 基于扎根理论的社交媒体用户倦怠情绪与转移行为研究[J/OL]. 图书馆杂志, 2021, 40(06): 110-118. DOI:10.13663/j.cnki.lj.2021.06.015.
[35] 张帅. 社交媒体虚假健康信息特征识别[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21, 65(09): 70-78.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1.09.008.
[36] 贾若男;王晰巍;孙玉姣; 社交媒体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辟谣信息主体研究[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21(19 vo 65): 16-25.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1.19.002.
[37] 陈悦, 陈超美, 刘则渊, 等.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OL]. 科学学研究, 2015, 33(02): 242-253. DOI:10.16192/j.cnki.1003-2053.2015.02.009.
[38] 田维钢, 温莫寒. 价值认同与情感归属:主流媒体疫情报道的短视频生产[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42(12): 9-14.
[39] 孙俐丽, 巫超. 突发重大事件中公众风险信息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J/OL].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0, 43(8): 38-43+28. DOI:10.16353/j.cnki.1000-7490.2020.08.006.
[40] 任围, 朱晓文, 胡怡. 风险感知与防疫行为：新冠疫情背景下社交媒体与权威媒体的多元作用对比[J/OL]. 国际新闻界, 2021, 43(5): 23-42. DOI:10.13495/j.cnki.cjjc.2021.05.002.
[41] 蒙胜军, 尚珏婷, 张帆, 等. 社交媒体中新冠疫情科学信息传播效果与危机应对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科学家群体相关热门微博文本的实证分析[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13): 91-101.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2.13.009.
[42] 郭舒婕, 常玉兰, 杨巧芳, 等. 医务人员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认知及行为的调查研究[J]. 中华护理杂志, 2020, 55(S1): 736-740.
[43] 蒋俏蕾, 黄悦鑫, 张晶. 老年人健康传播研究:热点与趋势——基于 1997-2019 年中外文献的比较分析[J]. 新闻与写作, 2020(09): 45-54.
[44] 郭未, 沈晖.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社会心态:一个整合分析框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1(12): 157-164.
[45] 骆郁廷, 余杰. 疫情防控背景下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其引导[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9): 18-21.
[46] 卢恒, 张向先, 闫伟. 重大疫情中网络舆情的多属性演化分析[J/OL]. 情报科学, 2022, 40(1): 158-165+192. DOI:10.13833/j.issn.1007-7634.2022.01.021.
[47] 邓建高, 吴灵铭, 齐佳音, 等. 突发公共卫生网络舆情信息传播博弈分析[J]. 现代情报, 2021, 41(5): 139-148.
[48] 周惠子, 李学伟. 重大疫情视阈中自媒体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与干预策略[J/OL]. 北京

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19(2): 93-100. DOI:10.16255/j.cnki.11-5117c.2021.0027.
[49] 范敏, 周建新. 信息畸变与权力博弈: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的生成与传播机制[J/OL].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0, 73(4): 64-72. DOI:10.14086/j.cnki.xwycbpl.2020.04.007.
[50] 徐琦, 罗雪丹. 从中心化辟谣到人机协同：中国网络辟谣平台的范式升级——基于1228条新冠疫情辟谣数据[J/OL]. 全球传媒学刊, 2021, 8(3): 85-101. DOI:10.16602/j.gmj.20210022.
[51] 王显芳, 张亮, 张宁. 基于前景理论的微信健康信息质量三方博弈分析[J]. 计算机科学, 2022(S1 vo 49): 694-704.
[52] 崔家勇, 王锡苓. 社交媒体中的新冠疫苗信息框架及其对疫苗犹豫的影响——基于新浪微博的内容分析与在线控制实验[J/OL].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2, 12(03): 165-180. DOI:10.13365/j.jirm.2022.03.165.
[53] 陈娟, 罗可心, 李金旭. 不确定性管理视角下家庭传播对孕产妇健康影响研究[J]. 新闻大学, 2022(03): 76-89+119-120.
[54] 王晟旻, 宋英华, 刘丹, 等. 基于社会燃烧理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情绪传播模型[J/OL].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21, 31(02): 16-23. DOI:10.16265/j.cnki.issn1003-3033.2021.02.003.
[55] 孙少晶, 陈怡蓓. 学科轨迹和议题谱系:中国健康传播研究三十年[J]. 新闻大学, 2018(3): 84-97+150.
[56] ISAAC CHUN-HAI FUNG, CARMEN HOPE DUKE, KATHRYN CAMERON FINCH, 等. Ebola virus disease and social media: A systematic review[J/OL]. American Journal of Infection Control, 2016, 44(12): 1660-1671. DOI:10.1016/j.ajic.2016.05.011.
[57] 顾昕, 郭凤林. 科学、公众与疫情的社会治理——科学传播学的视角[J/OL]. 科学学研究, 2020, 38(07): 1153-1160. DOI:10.16192/j.cnki.1003-2053.2020.07.001.
[58] JEONG-NAM KIM, JAMES E. GRUNIG. Problem Solving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A Situational Theory of Problem Solving[J/O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1, 61(1): 120-149. DOI:10.1111/j.1460-2466.2010.01529.x.
[59] LESLIE J. HINYARD, MATTHEW W. KREUTER. Using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as a tool for health behavior change: a conceptua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overview[J/OL]. Health Education & Behavior: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2007, 34(5): 777-792. DOI:10.1177/1090198106291963.
[60] 周裕琼, 尹卓恒. 健康传播研究的中国意识：中外发展比较与评析[J/OL]. 全球传媒学刊, 2022, 9(1): 112-128. DOI:10.16602/j.gjms.20220008.
[61] 樊小玲. 媒介的主体性偏向与超越性弥合：媒介变迁的另一种逻辑[J/OL]. 东岳论丛, 2021, 42(12): 56-65.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1.12.007.
[62] 刘少杰. 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OL].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2022-11-27].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815845/.
[63] 苏婧, 李智宇. 超越想象的贫瘠:近年来海内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及对比[J/OL]. 全球传媒学刊, 2019, 6(3): 4-33. DOI:10.16602/j.gmj.20190023.
[64] 庞祯敬, 李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风险应对行为形成路径研究[J/OL]. 医学与社会, 2022, 35(2): 1-8+12. DOI:10.13723/j.yxysh.2022.02.001.
[65] 黄晓伟. 后常规科学时代的风险传播：起点、规范与理性根基[J/OL]. 新闻界, 2021(5): 40-46.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10524.001.
[66] 秦瑜明, 周晓萌. 再造现代性：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与社会治理[J]. 现代出版, 2020(5): 52-57.
[67] 贾鹤鹏, 苗伟山. 科学传播、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的理论溯源及其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启示[J/OL]. 国际新闻界, 2017, 39(2): 66-89. DOI:10.13495/j.cnki.cjjc.2017.02.004.
[68] 宫贺. 对话何以成为可能:社交媒体情境下中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路径与挑战[J/OL]. 国际新闻界, 2019, 41(6): 6-25. DOI:10.13495/j.cnki.cjjc.2019.06.001.
[69] 胡百精. 健康传播观念创新与范式转换——兼论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困境与解决方案[J/OL]. 国际新闻界, 2012, 34(6): 6-10+29. DOI:10.13495/j.cnki.cjjc.2012.06.006.
[70] 张弛. 云医疗视野下的中国健康传播探究[J/OL]. 甘肃社会科学, 2021(4): 97-104. 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21.04.013.

[71]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EB/OL]. [2022-11-29]. https://www.who.int/about/governance/constitution.
[72] 代涛. “以人为中心”整合型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的关键要素研究[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22, 15(1): 2-10.

作者贡献说明：

张云钒：提出论文选题，撰写和修改论文；

李卫东：提出分析思路和修改意见，修改论文。

Research on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n post-epidemic era: theory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prospect

Zhang yunfan, li weid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provided a unique research domain for 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Diverse topics have emerged, and multiple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concentrated in a short period, due to the varied communication scenarios involving complex interactions among multiple entitie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mainstream media discourse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pandemic, governance mechanisms of social media health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health risk perception, health information exposure, and the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on health behavior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Health communication is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risk communic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health services, such as cloud-based healthcare technologies, which have endowed health communication with new characteristics. The "communication-oriented" feature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has further deepen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onstraint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paradigms need to be reformed by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health and shifting towards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to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Key words: post-epidemic era, health communication, Citespace, content analysis